



22

湖北文史资料

一九九二年第三辑(总第四十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目 录

在五战区长官部任职五年的回忆	张寿龄(1)
新桂系在鄂北与陈诚的矛盾片断	黄宗儒(11)
第五战区艺术宣传队始末	戴子腾(17)
武汉陷敌后混乱的华中局势	郑桓武(47)
沦陷时期湖北的敌伪青年组织	程 华(58)
武汉沦陷时期日军特务部的一些情况	袁范宇(67)
回忆父亲马哲民先生	马宝琳(75)
王葆心先生家传	王延杰(107)
我所知道的曾宪成	李子福(116)
回忆湖北省立十三中学校长吴经明先生	鲁祖鸿(137)
叶蓬其人其事	蓝恕轩(143)
从黄埔军校学生到国民党将军	余宗盘(166)
我在江汉中学十年的经历	陈英才(189)
戴季陶枝城投江遇救及报恩的经过	萧长勤(195)
暗杀杨永泰之谜	许复七(200)
国民党湖北省保安团队的变迁	金朝振(202)

第二次直奉战争漫忆.....	杨玉荣(206)
驾机秘密转移张学良将军去台湾的经过.....	王赐九(225)
1946—1947年黄河堵口复堤工程回忆	陶述曾(229)
十多年来武汉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回顾.....	刘汉林(237)

在五战区长官部任职五年的回忆^①

张 寿 龄

1938年春，国民党第五战区在徐州会战后，按照国家长期抗战保存实力的策略，由徐州向豫鄂地区作战略转移，同时作了有计划的与敌保持接触和阻击。司令长官部经潢川、浠水、宋埠、夏店、樊城，于1939年秋驻节在老河口，一直到1945年初李宗仁调任汉中行营主任，期间共达六年之久。当时，老河口的地位与抗日战争有着密切关系。我于1939年奉命负责在均县草店的周府庵筹办了为期一年的战区干部训练团，于1940年初调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办公室专任高级参谋达五年之久。现将所能忆及的当年有关事项作以下的概述，供史家参考。

—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的编制和人事安排是：在司令长官李宗仁之下为副司令长官李品仙和孙连仲，参谋长为徐祖贻（1940年调任中央军校第八分校教育长），副参谋长王鸿韶（徐祖贻离任后接任参谋长），司令长官办公室专任高级参谋张寿龄，参谋处长吴

① 本刊以前曾经发表过不少有关抗战史料，对大家了解当时湖北境内敌我双方的一些具体情况，起过一定作用，但限于条件，其内容仍有不少遗缺。今年是抗日战争55周年，我们特再次集中发表《在五战区长官部任职五年的回忆》等六篇史料，以资纪念；同时也是为了略补前之不足。

仲直（后易高松元），军务处长梁家齐，副官处长农之政，经理处长梁克监，军医处长项颢，电务机要室主任李杨。高级幕僚中有高级参谋黄敬修、温翹生、梁寿笙、王润民、张星拱、高鹏、陈痒、乔尚伦、李宇清等。顾问石颢，参议刘仲华、刘汉川、周范文等。秘书黄雪村、晁庆昌、潘鹤、陈更生、周天游等。

当时配属在战区的机构为：战区政治部主任韦永成，兵站总监部总监石化龙（后易张寰），军法执法监部执行监黄建平、军风纪巡察团团长石敬亨，炮兵指挥官张广厚，工兵指挥官沈蕴存，军粮局局长胡畏三（后易张超），别动军第六纵队队长徐之道，光谷警备司令部司令王家本（后继任的为刘剑奇、苏新民、梁家齐），阵中日报社总编辑为政治部秘书尹冰彦。

二

1939年以后的几年中，第五战区辖境左起桐柏山，右到大洪山，还有大别山区。战区正面的左翼在南阳，右翼在宜昌，横跨豫鄂两省，对侵占武汉的日寇，形成侧背包围态势。当时除大别山区由第二十二集团军李品仙副长官兼总司令负责外，在战区正面部队，从左至右为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黄琪翔的第十一集团军，孙震的第二十二集团军和张自忠的第三十三集团军（1940年5月张自忠殉国后，由该集团军的副总司令冯治安升任总司令）。孙连仲的总部驻在南阳。黄琪翔的总部驻在枣阳。孙震的总部在樊城。张自忠的总部在南漳。战区长官司令部设在老河口，虽系背水为阵，但以老河口的位置系属北通陕、洛，西通巴蜀的水陆交通枢纽。且以战区所属部队对日寇有一定的作战能力，徐州会战中均著有战绩。各将领对李宗仁心悦诚服，上下协调，军心一致。在李宗仁驻节老河口的六年中，日军一直未能逼近老河口。1945年刘峙接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时，把长官部迁移至均县草店。由于他的胆小如鼠，予敌以可乘之机，给老河口带来了不应

有的灾难。

我在长官部工作的五年里，参谋长王鸿韶主要负责作战方面的工作，与我一直在一起办公，相处得很投契。长官部当时驻在老河口东门内的胡家营一所小院里，所属各处室亦分散驻在长官部办公室附近的民舍里。那时老河口的地理形势，市区完全靠近汉江，南北两方是高约3公尺的残垣围墙，东门外至马窟山之间是飞机场。由于地区的局限，其它各机关均驻在市外东、南、北地区的村落和隔河对岸的地区。这样分散，也是防备敌机空袭的必要措施。

三

日军侵占武汉后，对在他后面的第五战区给他的威胁极为恐惧。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1939—1941年的三年里，敌军每年都要向五战区进行一次骚扰，企图达到以攻为守的目的。战区在预知日军的动态后，作了相应的准备和战略部署，予敌以重创，收到了预期的战果。

1939年初夏的随、枣之战，是在4月下旬开始的。敌军以四个多师团约十万之众，循襄花、京钟两线公路大举西犯，其作战目标重点是选定我大洪山、桐柏山两大据点，以期占领随、枣，继攻襄樊和南阳。我方以孙连仲和张自忠部，分别于桐柏山北麓和大洪山南部全力扼守左右两翼，相机迎击进犯之敌。另外八十四军和八十六军两军坚守正面，防敌中央突破。自4月30日与敌接触，展开激烈战斗。5月上旬，敌军虽一度进入随枣一线，但在我军的强烈反击下，5月18日又被迫撤退。当时汤恩伯的部队临时归五战区指挥参加此次会战。李宗仁原令汤部在西犯之敌进至随枣地区时予以包围，以期歼灭敌人于我的包围圈中，但汤恩伯不遵照命令，为保存实力，竟把部队撤到舞阳一带，未予敌以重创。因此他只听蒋介石的指挥，不服从李宗仁的调遣，李对他也无可

奈何。但其贻误战机，目无抗战，实属罪在不赦。战区虽向中央据实报告，但一直没有下文，不了了之！

1940年5月上旬，敌军又集中了六七个师团的兵力，仍循随枣一带向西窜扰。我方的战略部署是：以孙连仲部扼守桐柏山以北地区，以黄琪翔部担任正面阻击，以孙震部扼守襄河左侧地区，以张自忠部坚守襄河西岸，待机出动。敌军此次作战主力是沿襄河左岸前进，随枣线上采取佯攻态势，意在吸引我军主力，以便其在襄河左岸主力的挺进。由于我军已预料到敌军动态，当即令黄琪翔部后撤，诱敌深入，期达包围歼敌之目的。双方激战至11日，敌军向东南方向撤退，李宗仁长官立即抓住这一战机，令张自忠派出有力部队，迅速渡过襄河，向敌后出击，截击襄河左侧回窜之敌。张自忠亲自率总部直属部队特务营和七十四师的两个团，连夜渡河，在宜城县南瓜店附近迅即将敌军截为两段。敌寇受此突然奇袭，顿感惊慌，旋即发觉张自忠的兵力不多，遂又密集重兵，从南北两面将张部重重包围起来，展开激烈战斗。张自忠部终因众寡悬殊，在往复冲杀中伤亡殆尽。最后在张自忠总司令身边的只有少将高级参谋张敬和少将副官马孝堂。16日，张自忠和张敬同时在与敌拼搏中壮烈殉国，马孝堂因重伤滚落在山沟中，昏迷过去。当他醒来时战场上已寂无一人，敌军早已离去。马孝堂是张自忠、张敬壮烈殉国唯一的目击者。

1941年初，敌军又纠集约七个多师团的兵力，企图沿平汉铁路北犯，以打通平汉路。1月25日，敌分从信阳、确山、驻马店等地向西窜扰。我战区总结过去与日寇作战的经验，极力避免主力的决战，拖延和疲劳敌寇精力，然后相机予以袭击，致敌于疲于奔命之地，旷日持久，敌寇不敢恋战，即行撤退。这次豫南之战，也以我胜利而告结束。此后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战区渐趋于沉寂状态。

四

第五战区在徐州会战中与装备优势的日寇作战，主要靠军民的英勇战斗才克敌制胜，但干部特别是初级干部伤亡殊重，为长期抗战计，干部的增补整训，实为当务之急。战区于1939年初命我负责在湖北均县草店的周府庵遇真宫等处建立战区干部训练团，李宗仁兼任团长，以广西绥署参谋长张任民任教育长，我任教育处处长。张任民因事去桂林和重庆，团的教育责任实际上由我承担。团设有政治部，由战区政治部主任韦永成承担，另设有总务处，处长为刘剑奇，还有附属的医务所，所长孙荫坤（系德国耶那大学医学博士，实际上是李宗仁的随身医生）。干训团共辖三个大队，第一大队系军官大队，大队长谭小侠。第二大队也系军官队，附有一部分军士，大队长周仪。第一、二两大队各辖三个分队。第三大队为学生队，系招收战地的爱国知识青年。大队长张敬系由战区长官部作战情报科长调任的。张为福州人，曾留学日本炮兵士官学校，是个很有才干的人。这个大队共辖四个分队。战干团于1939年，奉令改为中央军校第八分校。战干团结束前，由张任民撰写了一篇为抗战建立战干团的纪实，由我们共同署名刻在武当山南岩宫峭壁上用以纪念。战干团结束后，我调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办公室专任高级参谋。张敬由我介绍到张自忠的第三十三集团军总部任高级参谋，于1940年5月在鄂北会战中随张自忠截击日寇，与张自忠将军同时壮烈殉国。

1940年，战区在老河口南杨林铺组成干部训练班，专门召集战区各部队中级以上军官，短期培训。李宗仁兼任班主任，并经常到该班讲课，同各干部亲切交谈。这个班的教育目的，主要是由各总司令以下干部交流作战经验，同时也使他们上下彼此之间增进友谊和加强团结。李宗仁既树立在他们心中的威信，也使他们的下情得以上达，为他们解决困难，这样做对促进将帅和部下

的相互了解和团结是著有成效的。

五

我在李宗仁身边工作多年，对李宗仁的为人和久在他身边的有关人物的情况比较了解，现摘要作如下的介绍：

李宗仁是个外柔而内刚的人。当时第五战区由他所统辖的部队，包括广西部队，都属于“杂牌”，如孙连仲、刘汝明、曹福林、米文和、张自忠、冯治安等部都是原西北军部队；孙震、陈鼎勋部系四川部队；廖磊、李品仙部都为广西部队。这些部队装备均逊于蒋介石嫡系的中央军，而在李宗仁的统帅下均能重创敌军迭建奇勋，究其原因，都由于李宗仁对他们推心置腹，使其心悦诚服，深知李宗仁绝对不会借抗日之名把他们消灭掉，而是激励其爱国之心，为救国杀敌而战，并适时而公平的予以补充。但李宗仁的执法却很严峻，毫不留情。徐州会战中，孙连仲部伤亡奇重，孙在电话中请李予以增援，李严令孙坚持战斗，只要前线还有队伍，就要负责拼到底。孙只好亲赴第一线指挥，终于击退敌军。而在平时李和孙见面时，仍亲切地称孙为仿鲁兄（仿鲁是孙的号）。李宗仁对我们这些高级幕僚，一向也是称其号而不呼其名。我的号为鹤舫，在他身边工作的十年中，他一直叫我鹤舫，这就令人对他有亲切之感。李的日常生活很俭朴，每日进餐时总要王鸿韶和我同他一起用餐。在共餐时间里，有时谈谈公事，彼此毫无拘束。平日除了重要事情由他决定外，一般作战计划，由王鸿韶负责，其它一般常务事情由我负责。李还把他的一颗私章交给我，可以便宜行事，以示他对我的信任，但有时我认为必须由他决定的，还是要向他请示。李宗仁身体素质很好，也很热爱体育，他在青年时期对马术和器械体操的单杠技术就是很出众的。在老河口的岁月里，公余之时，李宗仁经常要我陪他打网球。他在打球时也总是聚精会神地打到终场。他具有超人的胆识，对所属将领

均能量才使用。作为战区统帅，克尽厥职，临危不乱。例如在台儿庄会战中，虽属艰险，但他总是镇定自若，对部队运用自如，卒克顽敌，赢得抗战初期台儿庄的胜利，威震中外。战区自徐州战略转移中，敌机总跟踪寻我战区长官部所在地进行轰炸，而李宗仁很少离开长官部去躲避。1941年春的一天，敌3架轰炸机在老河口司令长官部上空盘旋。我感到不妙，请李到房外的防空洞去暂避，他坚持不去，后经再三劝说，方才同意。我们刚抵防空洞时，敌机的6颗重磅炸弹就从我们的上空投下，最近的一颗在离我们不到50公尺的地方爆炸。如果敌机早投半分钟，我们就难以幸免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站在那里仍神态自若。1941年敌寇向南阳窜扰时，曾有一部敌军骑兵，流窜到距老河口30余华里的地方，参谋长王鸿韶即令长官部所属各处撤到襄河以西的谷城、石花街等处，而李宗仁本人仍很镇定的住在他的住室。他这种镇定自若的态度充分安定了军心。李曾对我说：“人对于死总会感到恐惧的，但当他想到自己担负着救国杀敌的重任时，就不会去怕它了。”这正说明他身为统帅的责任感是非常强烈的。

参谋长王鸿韶，字真吾，河北宝坻人，保定军官学校前期同学，陆军大学特别班毕业，为人精明稳健。在抗战期间的战略指导和对部队部署都很精细周密。他常说：“对敌作战，敌情的了解很重要，而针对敌情，将自己部队分配在适当的位置上尤为重要。”所以每次对敌作战前，他对参谋处拟出的方案都仔细审核纠正，极尽运筹帷幄之能事。我和他因系同学关系，又在一起办公长达五年之久，在公余之暇谈些往事，同时也成为文字之交。他的文学修养很好，很受李宗仁器重，在抗战期间以至汉中行营和北平行辕期间，他一直任李宗仁的参谋长。

机要秘书黄雪村，湖南湘潭人，很有才华，文笔秀丽。李宗仁的机要文件和书信稿件等多出于黄的手笔。他一直在李的身边。李宗仁任代总统时，和谈代表团去北京向中共中央呈递的函件，也

都是由他主笔。

参议刘仲华，山西孝义人，系中共党员。红军长征前的一段时间里，他在上海负责地下工作，后来去法国巴黎，和李宗仁派往法国留学的韦永成相识。抗日战争爆发后，刘随韦永成回到广西，经韦的推荐成为李宗仁的客卿，一直留在战区。我是在汉口时经老朋友黄建平的介绍和他认识的，后来在战区终日接触成为好友。刘在战区不担任任何工作，李宗仁经常和他谈论些国际形势问题，有时对奕消遣。李宗仁任代总统与中共和谈时，刘曾任随团顾问去北京。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北京房管处处长和园林管理局局长等职务，“文革”期间被“四人帮”迫害逝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被迫认为烈士。

六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在老河口期间，李宗仁注意到当地百姓的保健医疗问题，特在市区中山公园内筹建了一所平民医院。院长孙荫坤，字晓山，江苏人，曾留学德国，获得耶那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是李宗仁的随身医师。内科主任吕文若，上海人，曾留学日本。外科主任侯道之，山东人，齐鲁大学医科毕业。当时由于日寇经常对老河口轰炸，这所医院也尽了为老百姓救死扶伤的责任。

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虽不经常住在战区，但她很关心妇女工作。她特在战地组织了一个妇女会，这个会主要宣传抗日救国，军民团结，促进妇女界为抗战贡献力量。她每去后方时，就把这个妇女会的事务交由我妻张梦兰代她负责。这个组织在李宗仁调往汉中行营任主任后，也就结束了。

抗日战争初期那几年里，日寇的空军较占优势，我军的防空武器又少，敌机在我大后方疯狂轰炸。在第五战区，总是跟踪司令长官部所在地，进行轰炸。例如在汉川、浠水、宋埠、襄樊等

处，司令长官部就曾多次遭到敌机轰炸。特别是在司令长官部进驻老河口的1940年初夏时的一天，敌人以63架大编队的重轰炸机，对老河口和光化县城进行轰炸，使地方房屋遭到很大的破坏。1941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对日宣战，中国抗战形势和制空方面起了很大变化。敌机白天已不露面，改为夜间偷袭。美国的一种名叫“黑寡妇”的飞机到老河口后，敌机夜间飞行，频频被“黑寡妇”击落，从此敌机敛迹了。最后美军的“空中堡垒”—B29巨型轰炸机对敌作战时，借老河口机场起降，直至日寇无条件投降，我后方军民得以专致力于地面抗击日寇，不再担心敌机的空袭了。

抗战初期，苏联派有顾问团随司令长官部行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驻老河口期间，苏联顾问住在长官部东边的一个招待所里，首席顾问是巴格丹诺夫上校。战区在历次与日寇会战，制定作战计划时，都要和首席顾问研究。但由于他们对我们的将领和军队素质不了解，所以他们的建议多与实际情况的需要不符，只供参考而已。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苏联顾问均调离战区。继之而来的是美国顾问，首席顾问为古瑞芝上校。他的助手是葛雷姆上尉。他们到战区后，即由我陪同，先到南阳第二集团军前线刘汝明的部队参观战地对抗演习、实弹射击以及前沿阵地的实况，他们观看的都很仔细。旋又到襄樊第二十二集团军孙震部队，在岷山一带观看了部队有关防御战的实况以及爆破实施等演习。他们对我们部队吃苦耐劳、军民融洽协同抗战的精神颇为赞赏。我记得美国顾问有一次在和我交谈中，提到我们军队的生活时说：“我很佩服你们这种战斗精神，在这样艰苦条件下作战，如果在欧洲的某些国家中，士兵就可能不再打下去了。”在老河口的顾问招待所里，还经常有因飞机发生故障或失事时跳伞、降落的美军空军人员，他们到招待所休息之后，又另搭乘派来的飞机去执行战斗任务。中途岛之战，日本海军遭受美军击败的空中摄影，曾由美

国顾问给我看过。从照片上可以清晰看到日本舰队被击毁和沉没时的景象。

八

1945年1月，李宗仁调升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汉中行营主任后，我亦被任命为汉中行营中将总务处长而随李去了汉中，结束在老河口的生活。抗战期间，我在老河口住了五年之久，它留给我的印象是深刻的，至今我对它一直萦念于怀。感叹之下，特献诗一首，用以志念：

缩毂秦川水陆关，地灵人杰迥非凡。军民力协驱倭寇，
永庆升平乐尧天。

（老河口市政协供稿）

新桂系在鄂北与陈诚的矛盾片断

黄宗儒

1939年春，李宗仁的第五战区防区为襄樊、随县、枣阳一带，因为盛产大米的钟祥县已被日军占据，鄂北一带军民粮食常感困难。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令兵站总监部向汉水下游（宜城以下）采办大米（因第五战区部队官兵以两广人和四川人居多，不惯食面），以供军食。但该总监部办回之大米，多是潮湿霉坏和夹砂，而且每包（200市斤）米常少二三十至四五十斤不等，官兵十分不满，又因操纵市面粮价，人民亦表示反对。陈诚（时为湖北省主席兼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为此对第五战区长官部和兵站总监部极为不满，并电军事委员会查办。军委会后勤部不得不将第五战区兵站总监徐文明（江西人）免职，请李宗仁另荐要员接充兵站总监。李推荐曾其新接充。白崇禧即将徐调任军训部办公厅主任。

我于1939年4月中旬与曾其新到襄樊，李宗仁即嘱我组织战区粮食管理处和军事委员会，同时委我充任粮食管理处处长兼购粮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兵站总监部副监。同年5月我辞去副监兼职。1939年5月1日粮食管理处和购粮委员会同时成立粮管处（简称），职责系调节战区军民粮食。购委会（简称）专门办理军用屯粮以备作战时拨交兵站供给部队食用。我率粮管处和购委会一部职员到宜昌采购大米，用手推车和胶轮拉车运到襄樊，以供军食。这是1940年5月中下旬的事。

我到宜昌筹粮约半个月，正拟大量采购大米，日军即向宜昌

发动进攻，陈诚亲到宜昌指挥第六战区作战。我去向他报告来宜昌采办大米事宜。他一听到第五战区办粮事，即发怒质问我，陈说：“你们战区以前米案尚未搞清楚，为什么又来办米？”我答说：“以前米案是兵站总监部之事，我是新成立的粮管处和购委会，奉李长官派来办米的，前案与我无关。”陈始无言，转和其他来坐之官长谈话。这是陈诚借米案来打击第五战区。后来，宜昌战事日紧，随即沦陷；我们的粮尚未采购，即向后撤退。

在这以前的1940年春天，军政部至老河口设立军粮局，将战区军民粮食划分责任。军粮局负担平时（不作战时）军事机关和部队口粮，粮食由省政府粮政局就地拨给军粮局转发部队；粮管处专管民粮，并调节市场粮价；购委会则向产粮地采购或征购粮食，屯储后方，以备部队作战时拨给兵站供给作战部队食用。

由于鄂北产大米之随县于1939年5月又遭沦陷，军粮供应更感困难。军粮局之粮，都是由湖北省政府驻老河口办事处就地拨给。军粮局接到拨粮通知书后，即去收集屯储粮食（局长张寰超为节省经费，不设粮仓），借民房屯储，责由该屋屋主或乡保长负责保管。军事机关或部队向军粮局请领粮时，则由军粮局发给通知单，向某县某乡村去取粮时，往往由朝至暮方取到粮，有时老百姓因他事或者外出劳动，无人在家取不得粮亦有之。士兵当日只有挨饿或食稀饭，甚至去围军粮局要饭食。因此，机关部队对军粮局十分不满，老百姓因为部队常来骚扰，逐家搜粮而怨声载道。军民矛盾日深，无法解决。

军队到民间搜粮，其骚扰不言而喻。于是地方绅士联名向湖北省政府控告军粮局。陈诚十分愤怒，即电参谋总长何应钦，电文略云：第五战区军粮局派兵逐家搜粮，骚扰不堪，若不将该局长严办，湖北三千万老百姓无以聊生。何将该电转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办理。李宗仁接电后，将该电交给我，嘱我执电去转交军粮局，并嘱我转知张寰超及时辞职，不必惊恐。张阅电时，神色

大变。我说：“李长官为你负责，不必惊恐，速请辞职可也。”张辞职后，李宗仁即调他到长官部充任经理处长。

张寰超之辞职，咎由自取。原来在军粮局成立时，曾组织了一个军粮委员会，军粮局长任主任委员，长官部经理处长、兵站总监、粮食管理处处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军政部军需局长和湖北省政府驻老河口办事处主任等均任委员。委员会成立时的第一次会议，长官部参谋长王鸿韶亲来参加，并担任主席。张寰超提议，为节省国家经费，军粮局不设粮仓，粮食委托当地乡村长和老百姓代为保管，军队领粮时，由军粮局发通知单给部队向乡村长或老百姓家领取，实两皆便利。我当即反对，我说：“俗语有句话，秀才遇着兵，有理讲不清。中国军队到老百姓家没有不骚扰的。而且战事一发动，老百姓未有不先逃跑避难的。此时部队向谁领粮？不设粮仓，我不赞同。”省政府驻老河口办事处代表同意我的主张。但王鸿韶说：“为国家节省经费是很好的。”其他不置可否遂通过。会后，我即声明，如此办法，以后开会我不再参加。因为王同意张的办法，故长官部袒护张的错误行为，为张负责。王又说：“张因节省国币，遭到民怨，这是一种忠公体国的表现。”

张辞职后，李宗仁想委我接充军粮局长，王鸿韶征询我的意见。王转电兵站总监部副监严兆丰问我是否同意，我推辞不就。于是该案不了了之。

1941年冬，我在湖北省政府老河口办事处与该处主任施亮东谈话时，施说他不能再干下去了。我问：“为什么？”他说：“省府陈主席嘱我先顾民食，百姓有余粮时，再拿来拨给军粮。而长官部又要我先顾军粮，再顾民食。现在抗战，军粮重于民粮，部队无食，哪能打仗？对于军粮我要负完全责任，我若先顾民食后顾军粮，士兵食不饱，长官部要杀我的头；若只顾军食，不顾民食，省政府亦要杀我的头。实在左右为难，焉能再干下去！”我说：

“你双方兼顾，则诸事即通矣。”施说：“鄂北非产米之区，焉能双方兼顾？”我当时观察一个战区，有数十个粮政机关，如兵站总监部粮食管理处、购粮委员会、军粮局、省政府粮政局老河口办事处等互不统属，各自为政，认为实不合理。遂由1941年4月，自动呈请司令长官部将粮食管理处裁撤，秋季并结束购粮委员会。该两机关裁撤后，因无机关负责到宜城下游向接近敌区市集抢购粮食运往后方，调节市面，粮食价格一日数涨，大闹粮荒。

按照惯例，长官部每周开一军事机关汇报会议，由长官部参谋长作主席，长官部各处处长、高级参谋、参议、兵站总监（副监）、总监部参谋长及各处处长、兵站医院院长、军法执行监、新兵补训处处长、老河口警备司令部和各集团军总司令部驻老河口办事处处长均参加。粮管处撤销后，我以参议资格参加。每次会议，除汇报上星期工作情形外，多是谈粮问题。参谋长王鸿韶为粮食常感头痛；老百姓亦因粮价波动太剧，街谈巷议惶惶不安。

李宗仁为粮荒之事，叫我去谈话。李问我说：“以前（指1940年冬南阳会战以前）我战区部队官兵人数共30余万，百姓未有闹过粮荒之事。现在部队拨去第六战区10余万人，减少了三分之一，鄂北一带又不是灾荒，为何反闹粮荒，这是什么缘故？”我说：“这完全是人为造成，并非灾荒，亦非缺粮。”并将原因对他说明：一因陈诚故意为难第五战区。二因军粮局派兵逐家搜粮，老百姓将粮食收藏。三因粮管处裁撤后，无机关到宜城县下游之接近敌区市集抢购大米运后方调济军民粮食。四因汉水两岸帮会林立，土匪甚多，粮商未有军队保护，不敢到下游购运大米。李听我详报后，默然不语。

第六战区是负保卫重庆陪都之责，它的防线是在湖北秭归县以东长江南北两岸。陈诚为巩固他的防线，免有后顾之忧，拟将第五战区唯一的后方补给线彻底破坏，实行封锁，即由四川省奉节县经大军河、大宁厂、田家坝、石花街至老河口一带山地彻底